

◎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·文学期刊篇④

以包容的心态等待好作品

——《十月》主编陈东捷访谈

何 平

当年《十月》的作品往往领风气之先

何平：好多年前李云雷访谈你，你说过，上个世纪80年代初文学期刊几乎享有第一媒体的地位。文学期刊是一个比文学更大的公共空间，文学就像一个被放大的发声器官，满足了全社会发声的需要。这也许能够部分解释为什么1990年代媒体资源丰沛之后，文学期刊的社会影响力不断走低。你是从1980年代的文学读者成为1990年代的文学编辑的，完整地见证了这个过程，从传媒的角度，你觉得文学期刊的常态应该是什么样子的？

陈东捷：历史上的文学喷发期，似乎都与特定的历史变革有着紧密的关联，在那些历史节点，社会变革与思想解放相伴而生，互为因果，带来了整个社会强烈的表达欲望。作家敏锐地捕捉到群体的兴奋点并形象地表现出来，就担当了群体代言人的角色。大家都急于表达，而发表的空间相对狭小，带来了文学期刊的迅速崛起。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，一个媒体匮乏的时期，文学期刊刊登的作品承担了非常多的功能，社会认知、思想启蒙、情感抒发，等等。有些本应由学术、新闻、娱乐等其他领域承担的责任，由于这些领域的相对滞后，读者主要从文学作品中获得。后来，随着其他领域的进步和媒体资源越来越丰富，文学从原来的急行军状态放慢了脚步，逐渐回归文学自身。文学期刊也从社会话语的中心回归到文学话语。

纵观40年来的中国文学，经历了一个从快速到缓慢的过程。先是朦胧诗、短篇小说、报告文学、剧本，逐渐过度到中篇小说、散文、长篇小说，文学期刊也从每期不足100页的月刊，过渡到普遍200页以上的大型双月刊，也大致印证了这个过程。

我觉得就发行量和社会影响而言，目前国内文学期刊的状态，基本可视为一种常态。我也对国外纯文学期刊的现状做了一点功课。美国尚在出版的此类期刊有200余种，基本由大学、基金会和媒体集团主办，不以盈利为目的，发行量大致在两三千册。

就文学期刊的内容和版面形式来说，我个人觉得期刊既然俗称杂志，就应突出一个“杂”字。相对图书而言，文体多样、版面语言丰富，都是题中应有之义。

何平：我们现在看《十月》创刊最初几年的那些引起巨大社会反响的小说，往往都触动了社会某一根敏感的神经。可能也不单单是《十月》，这是整个时代文学的症候。

陈东捷：对。上个世纪下半叶，国内文学期刊经历了两个创办

高峰，一个是1950年前后，另一个是1980年前后。单说1980年前后创刊的这些杂志，创刊之初，因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文学氛围相同，在作品的选择去向方面体现了很强的一致性，带有非常明显的时代烙印。一部分期刊从众多期刊中脱颖而出，靠的就是一篇篇产生巨大社会反响的作品。只是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，西方现代主义作品大量译介到国内，文体探索蔚然成风，期刊才从办刊风格方面出现了差异。



我至今仍然特别想念《十月》创刊之初的那些编辑前辈，他们的专业、敏锐和勇气令人敬佩。当年的《十月》小说、报告文学、剧本、诗歌、散文、评论多点并进，刊发的作品往往领风气之先。当时文坛有文学期刊“四大名旦”一说，《十月》被命名为刀马旦，可见当时的锐气。

通过多种文体形式丰富读者的阅读体验

何平：《十月》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贡献，某种程度上和它一开始选择了中篇小说这种“时代文体”有很大关系，而且《十月》40年给中国当代文学提供的经典最多的也是中篇小说。但最近这些年，有的情况开始发生变化。《十月》从2004年起每年单独出版6期长篇小说，2019年新一期《十月》也发表了阿来的新长篇，这是不是意味着《十月》在未来办刊方向上会作出一些调整？

陈东捷：《十月》创刊之初，中篇小说就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。据统计，在80年代初的前两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评奖中，总共30篇左右的获奖作品，首发于《十月》的就占了10篇。《高山下的花环》《没有纽扣的红衬衫》《黑骏马》《北方的河》《绿化树》《腊月·正月》《蝴蝶》等等，不胜枚举。这一传统至今仍在保持，因为中篇小说目前仍然是一种重要的小说文本。

进入新世纪以来，长篇小说创作越来越被重视，《十月》于2004年改为月刊，单月出版的六期仍保持综合期刊的面貌，双月出版的六期主要刊发原创长篇小说，偶尔也会登载长篇非虚构作品。

出版周期的缘故，有时优秀的

长篇小说作品因来不及在长篇小说版推出，也会刊登在综合版。目前杂志社还没有整体调整办刊方向的打算。

何平：文类等级上的“小说崇拜”，甚至是“长篇小说崇拜”有时会造成文学史偏见，对刊物的观察尤其要警惕“小说崇拜”，以1980年代《十月》做例子，我们承认《十月》对中国当代小说作出的贡献，但应该意识到这一阶段，《十月》在诗歌、话剧、电影剧本和文学批评诸方面的探索和成就，尤其是研究1980年代的先锋文学，不能忽视《十月》的话剧和“十月的诗”。

陈东捷：我刚才说过，“杂”是文学杂志应有的特征，我甚至认为全文刊登长篇小说不应成为文学杂志的主要任务，这项任务应主要通过图书出版完成。

如你所说，《十月》作为文学期刊的成就不仅仅体现在小说方面，“十月的诗”、剧本、非虚构类作品、评论，都曾产生过非常大的影响。近年来，我们相应扩大了散文、诗歌的版面，就是想通过多种文体形式丰富读者的阅读体验。

《十月》刷新了散文的陈旧面目

何平：世纪之交，《十月》完成了新老交替，你，还有顾建平、周晓枫、宁肯等60年代出生的编辑成为《十月》的中坚。与此同时，《十月》的办刊思路也相应发生变化。除了前面我说的《十月》（长篇小说）创刊，《十月》在“小说新干线”和“新散文”两块持续发力。“小说新干线”，1999年开栏，到现在已经20年，这是中国文学期刊史上持续时间最长、推介文学新人最

多的常设栏目，到目前为止就涉及到从“60后”到“90后”的几代作家100余人。

陈东捷：上个世纪末，杂志社的年轻编辑只有我和顾建平两人。年轻人与知名作家联系少，更关注同龄人的作品。想起当年开办这个栏目时，至今仍感到兴奋。不停翻阅其他杂志上发表的年轻作者的作品，筛选出有创作潜力的作者，写信联系，商谈、改稿、编辑、写评价，看到被推出的作者被关注，真是作为期刊编辑的幸福时光！后来又不断有其他年轻编辑加入该栏目的组编工作，至今，“小说新干线”栏目今年20周岁，已成为《十月》的品牌栏目，我们曾组织过两次该栏目作者聚会，大家畅谈往昔，恍然产生了历史感。

至于“新散文”，新世纪先后加入《十月》的周晓枫、宁肯本来就是新散文创作的干将，推出相关作品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。

何平：“新散文”栏目从一开始的学者散文到后来年轻作者的探索散文，《十月》刷新了散文的陈旧面目，它也是比较早的推专栏作家的文学期刊，这项任务在近几十年李敬泽的“会饮记”出现在《十月》也就不意外了。我觉得也正是有这些“新散文”栏目，《十月》才更像一本“杂”志。因为，是“杂”志，《十月》可以有“思想者说”，有“国际期刊论坛”，有今年新增加的栏目“译界”。除了办“杂”志，《十月》参与的文学活动所基于的国际或者世界眼光在业界也领风气之先。

陈东捷：把杂志做“杂”，其实操作性最强的就是散文栏目。这些年我们在这方面颇花费了些心思，将来还要不停地花心思。

其实散文的概念相当宽泛，表现空间非常广阔。我们对散文稿件的选择突出其多种可能性，只要言之有物、言之成理、言别人所不曾言。对写作者来说，个性和创新是非常难能可贵的，我们要做的，就是选择有意趣、有新鲜感话题和合适的作者，以包容的心态等待好作品的诞生。



陈东捷



池 莉

另 一 种 珍 视

池 莉

◎ 创作谈

终于，拿到新书《大树小虫》样书了。40万字，捧在手里，沉甸甸的。飞快翻阅，溢出一股新鲜书香。原本以为，终于拿到新书，会潸然泪下，因为实在是来之不易，近乎10年的构思，近乎5年的写作，近两年的一改再改、再改、再改……此前多年写作，我都是一气呵成，从来没有遭遇反复修改。然而，我没有潸然泪下。我只是放下了手头的所有事情，手机静音，丢一边去，坐下来，开始静静阅读自己新书，这是比流泪更郑重的了。

《大树小虫》的写作出版，对我来说，非比寻常。原本以为，已经构思好的长篇写作，无非是一项重体力劳动。而写作过程却让我发现，它更是一项重脑力劳动。10年的写作，耗掉了一个生命，开始的，又是一个生命。《大树小虫》写三代人，历时近百年，我避开了传统的或者经典的线性故事，设计了方块加直线的不对称结构。我写一个个的个体生命，写他们在时空这株巨树上的奋力前行。由于时空弯曲，人物关系也就相互纠缠、互相碰撞、互相影响，甚至可以借用物理学的量子纠缠来想象，对于我来说，这是一个高难度动作。高难度动作还必须一再重复一遍，那就是修改。情愿以及不情愿地修改，都异常艰难，充满考验，还充满遗憾。辛亏在这种磨练中，我领会到了一种人生新知：珍视遗憾。

以前我的珍视，更多地投向那些一气呵成、很快出版、纷纷获奖的作品。珍视获奖。珍视圆满。珍视夸赞。珍视好运。珍视昂贵。珍视好东西。写作长篇这10年来，遭遇了种种以前从来不曾遭遇的写作教训与人生教训，令我逐渐知道了另一种珍视。逐渐地，我开始珍视残缺。珍视舍弃。珍视批评。珍视本该得到却失去的东西。珍视自己做的错事、或是蠢事——比如在当今这个碎片化阅读时代还坚持写作洋洋几十万字的大长篇，客观看起来，不免有点蠢，蠢我也十分珍视。我学会了珍视最日常的与昂贵毫不相干的普通东西。夏季到了。我会发现那把老旧蒲扇破损了边缘，某一时刻，我会搁下笔，端来针线盒，坐在迎光的亮处，穿针引线，为蒲扇缝边，其实网上大有新蒲扇可买还很便宜，原是我珍视这亲手工缝补，又是珍视这蒲扇的贴身跟我多年。我喜欢针线，从容不迫，将破损

缝补一新，我希望我能够这个样子，耐心修补《大树小虫》，也耐心修补自己人生的破洞——我珍视我还存有这种希望。某些事物也的确有意思：许多次，写作冲动会沿着针尖倏然升起，扎得我一跳一跳，遂放下针线，赶紧伏案写作，从针尖到笔端，两不相干却又紧密相连，文学灵感竟在最平常的事情里抽象地闪现，仿佛神迹，这简直太值得我的珍视。所以直至最后完稿，尽管我看《大树小虫》书稿还不够圆满，可我学会了珍视这不圆满。

许多的珍视，交集起来，变成了一种感恩。我感恩《大树小虫》的成书过程。我感恩《大树小虫》的成书过程。我感恩凤凰江苏文艺社友人坚持了10年的约稿与10年的惦记。我感恩天长日久持之以恒的写作，既给予了我工作的愉悦，也给予了我人生的磨砺，还力挫了我的娇娇二气。我的获得远远不止出版了一本新书，更有我对事物另外一个方面、以及多个层面的认识与理解，更富于智力与理性的认识与理解，而这一点，或许正是我的救赎之道。也是我在《大树小虫》的人物命运之中埋伏的这么一个道理：另一种珍视，恰当的妥协，在某些时刻，或许也不失为人生一种不可避免的选择。我希望有读者能够读出来，并对他们的人生有益。



池莉著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

《中国新诗总论》：

中国新诗理论之百年风华

沈秀英

《中国新诗总论》由谢冕主编，由黄河出版传媒集团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于2019年4月正式出版。《中国新诗总论》展现了中国新诗理论之百年风华，作为中国新诗百年实绩之一种，它以对新诗百年理论批评文献进行汇总的方式，清理了新诗的发展道路，展现了中国新诗学的创立和流变全貌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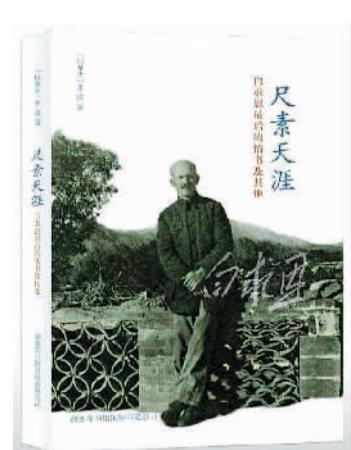
作为跨越百年的系统性理论批评文汇，对批评文献的选择标准是大家最感兴趣的问题，这是《中国新诗总论》首先要解决的核心点。笔者认为《中国新诗总论》遴选的首要标准是，文章必须曾经推动了新诗批评，或者对诗歌及其发展潮流进行过经典性阐释，或者对某些诗歌经典地位的确立起到过一定的影响作用；其次遴选秉承问题意识，在历史发展的每个不同阶段根据实际情况确立问题，然后站在问题的角度以话题的方式纳入有关诗学问题的理论与线索。

《中国新诗总论》对新诗研究论文的收集具有全面性特点。谢冕在工程伊始就提出一个重要原则，重要文献一篇不漏。为了少有“遗珠之恨”，各分卷主编通读史料，以历史的“后见之明”发现建设性的理论批评文本，譬如抗日战争时期诗歌理论

重塑英雄形象的一次收获

——读李彦《尺素天涯——白求恩最后的情书》

朱 斌



李彦著

商务印书馆出版

就重构了白求恩的形象：绝非完美无瑕，但终究令人敬仰。恰似我们多年不见的一位老朋友，突然在街头相遇了，顿时令人情不自禁，生发出既熟悉又陌生的复杂感受。它依靠“非虚构”，还原了一个更真实的白求恩形象。

这里，当然有我们熟悉的身世：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，救死扶伤的英雄。然而，它又融入了诸多我们陌生的成分，尤其是白求恩充满真情的诸多夫子自道。这使其形象更加鲜活起来，如同夏日的阳光，以及阳光中碧绿的榕树叶，能让你感受到其真真切切的温暖和实实在在的生机。难能可贵的是，它还融入了诸多我们更加陌生的“他者”视角：白求恩热爱绘画，建过儿童美术学校，办过个人画展；他喜欢写作，发表过小说……

这种英雄精神的传承者，也包括蒙特利尔社会主义团体的艾奇思



加拿大华人作家李彦

和米雪等人。他们是清贫的知识分子，却无私地奉献自己，“致力于发扬白求恩所代表的国际共产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精神”。

作品强化了英雄的生活气息与个性内涵，使得英雄形象在精神结构方面有着更丰富的人性内容，让英雄及其精神传承者，都从曲折有致的叙事小径上，满面红光，真气逼人地向我们走来。

这是新时代“非虚构”写作在重塑英雄形象方面的一次收获，是致敬英雄为他们默默点燃的一炷心香，还是从更多视角、更多维面塑造更真实、更人性、更立体英雄形象的一次示范，因而能为新时代的英雄书写提供诸多有益的启发。

的发展很不均衡，差异较大，负责该分卷的主编兼顾不同地区的诗歌理论，收录了一些不常见的论文。《中国新诗总论》为了呈现全面的诗歌理论风貌，还选录了一定量的台湾论文，体现台湾与大陆的互动关系。

《中国新诗总论》对新诗研究论文的收集还注重理性和严谨性。该文集选择的不仅仅是大家公认的名篇，而且注重从研究本身学理的深度与厚度方面进一步筛选；各分卷主编还重视重要资料的原始性，他们积极地查找原刊原版，审慎地拍照、存档、使用。对学理性和严谨性的追求保证了《中国新诗总论》所收录的诗歌批评理论的精确性。

